

媒介的哲学逻辑及其历史建构 ——对波斯特信息方式理论的评析

蒋艳艳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南京 211189)

摘要:通过对前人理论的深刻反思,马克·波斯特提供了一种解读媒介的新方法——“信息方式”。作为“信息方式”,媒介包含着哲学逻辑和历史建构两层内涵。基于后结构主义立场,“信息方式”揭示了媒介背后的哲学逻辑;媒介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构型,语言的结构权力促使媒介在交往行动中构建着主体、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根据不同的哲学逻辑,媒介可划分为不同的历史形态。媒介的历史建构意义体现在,媒介的诸历史形态能合乎逻辑地建构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诸历史阶段,从而弥补同时期社会发展理论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局限。信息方式理论糅合了媒介批判学派的哲学视域和媒介环境学派的历史视角,开辟出当代媒介研究的新向度。

关键词:媒介;信息方式;哲学逻辑;历史形态;历史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6)04-0149-06

“信息方式”的最初提出,来源于马克·波斯特本人的理论积淀与学术敏感。面对快速发展的电子媒介及其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他敏锐地意识到现有媒介研究方法论的不足。基于观察到的后现代现实,他试图将后结构主义和社会语境的方法论引入到媒介研究中,重新解读媒介。“信息方式”,与其说是一个新的传播学概念,毋宁说是一种创新性的传播学方法论,是一种解读媒介的新方法。

一、作为“信息方式”的媒介

20世纪80年代,信息方式理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该理论由美国加州大学马克·波斯特最先提出。专职于历史学研究却倾心于哲学思辨的波斯特有着独特的学术风格,思想史的背景让他有着更加宏观的研究视野,哲学的兴趣使他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特别关注,而批判性的历史思维又使得他对西方批判理论情有独钟。如同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波斯特将自己的研究视线越来越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最终形成了融合哲学、历史与媒介三大学科视域的独特理论。“信息方式”正是波斯特学术思想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范式。

波斯特在《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书中就初步界定了“信息方式”：“这一术语标明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由电子工业及相应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

新的语言经验(experience)。”^{[1]x}在后来的《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一书中,波斯特提出:“信息方式理论采取后结构主义的立场,集中于语言展开对西方理性的批判以及考察电子媒介这一新型语言结构中语言的重要性。”^{[2]5}到了《信息方式》,波斯特正式呼吁,生存于当代社会中的我们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媒介经验,需要发展一种“基于语言学的交往行动理论”,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能够“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同时也能够揭示每个时代的“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3]3-53}。

波斯特对信息方式理论的酝酿与构思建立在对前人理论的深刻反思基础之上,尤其集中表现在对后工业主义、马克思主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韦伯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在他看来,现有观点“都具有严重的缺憾,这些缺憾使他们难以提出一套信息方式的理论”^{[3]59-60}。波斯特最先着重考察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他认为以“后工业社会”为代表的后工业主义虽旨在生成面向新现实的新理论,但却犯下了最为严重的理论错误,与他的“信息方式”相距最远。贝尔首先陷入了总体化的诡计。他把总体性策略应用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社会新现实中,提出将“后工业社会”作为新的时代标签。这种以一种总体化立场替代另一种总体化立场的理论本身遭遇着众多诘难。虽然贝尔试图将分析范围限

收稿日期:2016-03-0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KYZZ15_0081)

作者简介:蒋艳艳(1989—),女,博士研究生,E-mail:jyy717@163.com

于经济社会结构层面,以规避技术决定论,但事实上仍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窘境。因为他的大逻辑层面的统计分析和一般事实的平板陈述使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不可避免地被网罗到信息技术变革下社会的一元定义之中。另外,总体的不可知性又迫使贝尔不得不采用主观断言的方法加以“证明”。在“知识与信息如今已是决定性变量”的宣称中,他用“变量”一词企图掩盖阐述的含糊性,但缺乏科学论证的总体化断言终究无法使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有效、合法。同时,贝尔的理论又对语言造成了压抑。20世纪语言学的崛起,尤其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出现,使西方学术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各学科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在波斯特看来,现代媒介有着独特的特征,更需要从语言学角度加以剖析。其一,信息的自由获取性和可复制性让现代媒介“起着反商品化的作用”。其二,现代媒介“打开了新型交流散播信息的种种可能”,这些可能性只有在语言学层面才能被更深刻地理解为一种交流形式的变革,以及交流主体位置的变更。贝尔的失误在于,他把信息交往浓缩成一个经济隐喻,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旧范畴中成功消化社会新现象,得出“多即好”的传播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韦伯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波斯特似乎抱有更温和的态度。他认为,这些理论框架“预见到其解释了被我称为信息方式的那些社会现象”“人们只需对他们的立场进行增补便可覆盖历史的诸多新发展”^{[3]44}。然而,这些理论还是有着一些共同的缺陷,尤其体现在语言学层面。马克思虽意识到自动化过程中科学所起的作用,并敏感于生产方式中变化着的社会意蕴,但只是将注意力投在了劳动和资本的内在矛盾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试图重新定位,将科学当作政治力量以及话语与实践的结合,却未触及信息内在交流结构和信息的主体构建作用;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进一步将马克思对劳动的关注转变为对个体意义的关照,但他的理论仍植根于行动与意识的二元论和理性支配的启蒙话语中,因而与语言学机制失之交臂;为了克服现代性理论的局限,哈贝马斯提出了“符号互动”的批判范畴,使工具性的理性行动转向符号的理性互动,但可惜的是,着眼于解放议题的他仍旧陷入了启蒙理性的观念之中,最终没能提出一个电子媒介交流的分析框架。前人理论的诸多不足,成为波斯特社会批判理论的起点。

在《信息方式》的导论中,波斯特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他要借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来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其说借用,毋宁说是批判性地借鉴。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定义为“一个历史范畴”和一个“终极的决定因素”,信息方式理论正是要批判性地继承马克思生产方式所具备的划分历史和决定历史的双重功能。波斯特意识到产生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理论如今已缺乏理论的现实有效性,已难以驾驭电子媒介带来的后现代社会。同时,总体化诡计和语言压抑也同样限制着生产方式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因而有必要在借用的基础上,用新的理论资源加以改造。他继而投入后结构主义的怀抱,关注在交往行动及交往结构中被构成的主体,为自己的媒介研究的社会语言学转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一个“能够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信息方式理论——呼之欲出。

波斯特首先揭示出“信息”的特殊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意符如今都被看作是信息,正如控制论中以及大众常说的那样,‘信息’与‘噪音’或无意义相对。”^{[3]5}从该界定中延伸出的“信息方式”自然具有广义的属性,指向社会文化生活中所有赋有意义的符号。与此同时,波斯特在许多论述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狭义层面将信息方式与电子媒介交流画上等号:“电子化通讯手段则与信息方式相联系”;“在信息方式下,一套新的语言/实践冲击了面对面及印刷文字语境下的种种既存语言/实践”;“分析电子媒介交流(我所称的‘信息方式’)”^{[3]16-83}……与其说这是波斯特在概念界定上的含混不清,倒不如说从侧面反映出信息方式理论的真正意义所在。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传播学概念,而是一个解读媒介的新方法论。从他非体系性的信息方式理论中可以窥探出媒介的两层内涵。其一是媒介背后的哲学逻辑。媒介的哲学逻辑是媒介自身内含着的哲学意蕴,是媒介的本质所在。“信息方式”借助于注重语言层面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将媒介看作“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以此勾勒出媒介背后的哲学逻辑,而非着力于现实视域中媒介的内容、制度和技术层面。其二是媒介的历史建构意义。媒介的历史建构意义以媒介的哲学逻辑为前提,强调媒介的不同历史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各阶段的建构作用。在此基础上,历史可以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结构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身为媒介批判学派的波斯特在不经意间糅合了媒介批判学派和媒介环

境学派的方法论特点^①,使哲学逻辑视域与历史语境视角统一于“信息方式”的方法论之中。

二、哲学逻辑:语言、交往、主体、世界与文明

作为当代媒介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波斯特的“信息方式”显然延续了批判学派形上思辨的哲学逻辑追求,认为经验学派对媒介文化形式的关注无法触及媒介的内在本质。但由于所处时代媒介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涉及到社会问题的差异,波斯特不再像早期批判学派那样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播媒介体制的弊端来激发受众获得清醒的媒介认知。他转而立足于更宏大的视野,采取辩证的方法,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媒介本身具有的哲学逻辑及其带来的文化后果。尤其着重剖析电子信息方式,以期通过对电子信息方式的认知,使人们在现时情境中看到早期的发展。正是这种较为中立、宏观的解读方式使我们认识到了媒介背后潜藏的哲学逻辑,它关乎语言构型,关乎交往行动,关乎主体构建,乃至关乎整个人类的文化进程与文明发展。

信息方式理论认为,媒介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构型,这与波斯特本人采用的后结构主义方法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原有社会理论主要产生于将主客二分的笛卡尔文化,产生于将心物概念推而广之的二元论形而上学。在这种理论范畴下,“日常的语言世界(观点、态度、观念及意识形态)也与行动的世界截然分开,变成一个可能与行动语域并不同步的独立语域”^{[3]21}。换言之,在二元对立的语域中,语言仅仅作为一种传播的中介和意识的表征,与主体及其行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多样化,语言的直接表征功能日渐式微。指涉对象的丧失使词与物的关系复杂化,语言表征他物的功能逐渐转向表征其自身,而新时代的电子媒介交流更是放大了语言的自指层面。传统社会理论二元对立的解读模式显然已经无法可靠解读“新语言”的作用。这种理论系统削减了电子交流的时空远距化作用,只是徒增了语言的表征力而已。因而为了更好地解读媒介的语言作用,波斯特自然转向了受20世纪语言学转向而产生的关注语言内在结构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鲍德里亚的“符号经济学批判”话语,福柯的“话语/实践”范畴和“权

力技术”理论,德里达的“书写”“延异”等范畴都被借用到他的理论论说之中,用以分析电视广告、数据库、电子书写等媒介现象,构成了信息方式理论运演的前沿话语框架。在后结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中各类型的交流构型在理论分析层面都是“自足的经验王国”,语言构型则是把握这些“经验”的指明灯。例如,波斯特以“电视广告”为例,参照鲍德里亚的理论,阐释了电视媒介具有的新型语言构型:“首先,电子媒介会话取消了语境,创造了新的言语情境……其次,媒体上的会话主要是独白式的,而非对话性的……第三,媒体的独白式无语境是自指性的……”^{[3]64-66}在波斯特看来,电视广告“非真实的被制作成真实的,被交流的是一套没有意义的意义”的境况,正是由其新的语言经验所营造出来的。

当然,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对语言的理解并不停留于“语言包装”的特殊形式,背后暗藏的描绘性结构性权力才是意指所在。这也正是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差异之处,前者将语言看作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后者把语言当作主体产生并接收的意义。相较而言,后结构主义笔下的语言无疑更具有能动性,其结构性权力体现在一方面构建着言说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构建着作为言说对象的主体。语言构型如何才能对主体产生构建作用?其中就涉及到了交往行动这个中间环节。虽然在波斯特本人的论述中,交往行动环节常常隐藏在论说之中,有时还与“信息方式”含糊等同,但仍然无法抹去其在信息方式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语言与交往行动本身有着天然的联系。语言是交往行动的基本中介,也是人类交往的最基本的工具;而人类的交往行动则给语言提供了交流的空间,同时赋予语言现实的意义。不同的语言构型,塑造了相异的交往行动方式,尤其是影响了交往行动的时空参数,主体正是在交往行动及交往结构中被构成着。鲍德里亚正是以这种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总结了电视广告对主体的后现代意义:“广告塑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新的意义组合,每个人都言说着这种语言,或者更确切点说,这种语言言说着每个人。”^{[3]82}具体而言,电视广告的语言构型是一种“不同步”的“独白式自指交流”,通过这类自指性语言产生的交往行动“脱离了言说者社群,被从生产方式下的物质基础中抽取出来”^{[3]94},在

^①媒介批判学派以哲学批判为其方法论特征,将媒介置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宏观背景之中,对大众传播媒介背后的体制形式展开全面、深刻而系统的批判与反思,以实现社会健康发展和人性自由解放的根本目的;媒介环境学派以历史研究为其方法论特征,主要采用宏观模式识别、历史比较分析、矛盾辩证分析等方法梳理历史演变中的诸种媒介技术形态,复原媒介技术影响下的诸种历史社会语境,从而进一步展望媒介技术发展的未来走势。

此基础上,电视广告一方面把观看者主体构建成一个消费者和旁观者合成体,使其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进而消解了观看者主体的自律特性,另一方面也同时解构了作为中心化原始行为者的主体构型。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特认为电子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4]83}。从语言构型角度引申出主体构建的分析方法无疑避免了如阿多诺等人所犯的对主客体二元、自律/他律二元律的坚持,能从客观角度评析正在被媒介文化重组的主体。

自主体在交往行动中被重新构成伊始,语言构型结构性权力的作用点便开始不断延伸。因为,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不仅主体在媒介交流中被塑造,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在其中被构型。在“信息方式”的语境中,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正是由媒介所构型的语言、符号世界。语言构型为世界提供了意义结构,交往行动为世界创造了时空背景,被建构的主体则是世界的构成元素,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信息方式”下特殊的世界。由于意义符号的涉入,这个特殊的世界不再单纯指涉世界的客观形态,而是指向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主体本身的建构过程也深谙着“信息方式”的文化建构旨趣,因为波斯特曾坦言:“信息方式所质疑的不仅仅是主体性的感觉器官,而是其具体形式;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它对该世界的看法,它在该世界中的位置。”^{[3]25}所以,自始至终,“信息方式”就不单单是一种新型的语言构型,不单单是一种被语言结构的交往行动,不单单是一种被交往行动建构的主体,它还是一个被构建的世界,是一种文化状态,一种文明形态。遵循这一路径,波斯特继续借助鲍德里亚的分析,考察电视广告的文化意义。电视广告以一种非再现性的、非工具性的传播方式对观众进行构建的同时,也从总体上将新的交流模式铭写进文化之中。这种被电视广告构建的文化成为一种仿像,一种没有原作、没有客体指涉物的拷贝,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超现实”。电视广告对文化和文明的变革作用能够在与前电视时代的比较过程中显得更为明晰。波斯特较好地总结了鲍德里亚笔下印刷文字与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书写稳定及排列有序的印刷文字是一种再现性的符合表意方式,通过文字在内心单向流动着的阅读行动构建出一个个自信且理性的主体,主体们反过来言

说着实在、理性、科学的话语,这些话语力量又共同结构出一个理性、自律的资本主义文明样态。电视广告对印刷文明产生的剧烈震荡就是始于语言构型从“语境化的线性分析”到“摆出一副客观外表的孤立数据的蒙太奇”的转变,它构型出一种去中心化的、非理性化的后现代文明,对基于理性的资本主义文明产生强大冲击。值得一提的是,波斯特如其他批判学派成员一样,信息方式理论最终旨在关涉文明形态中的政治生活,他尝试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中结合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利奥塔等学者的观点描绘新媒介形态下后现代政治的种种可能。

如此,媒介在信息方式理论框架中完成了全部逻辑演演;它以语言构型为出发点,历经交往行动,最终构建着主体、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具有后结构主义力量的媒介通过诸多环节成为了人类文明历史演进中重要的影响因子,从而得以发挥出其对历史的建构作用。基于此,波斯特从媒介的角度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行了独到且深刻的历史划分。

三、历史建构:口头、书写与电子

当“信息方式”从逻辑层面走向历史层面时,就方法论和研究视角而言,它似乎已从媒介批判学派的哲学逻辑视域转入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历史语境视角。

媒介环境学派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它的历史语境视角并非时代的标新立异。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学术界处于一种探究如何界定当代文明状况,如何预测未来发展趋向,以及如何划分文明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氛围之中,出现了众多宏大的社会发展理论框架。原因是当时社会正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革新,新技术的变革使高技术产业群迅速崛起,这些变化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出现了若干新的发展趋势。面对纷至沓来的转变,学者们纷纷提出种种新的学说,预测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丹尼尔·贝尔利用“轴心分析法”,基于轴心原则、经济形态和阶级结构三大标准,将美国社会经历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通过敏感的社会观察,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变化与趋势,把文明分成三次浪潮时期,从约1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阶段以及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信息化阶段;约翰·奈斯比特采用起源于二战时期的新闻报道内容分析方法,预测出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

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虽然这些理论的话语表述存在差异,但有一点得到了众人的认可,那就是信息技术是当代社会变革的核心推动力。然而,倘若立足在媒介与人类文明进程之关联的研究视域中,这些理论存在共同的局限之处,第一,只注意到现代信息技术对社会变革的作用,而忽视了早期媒介与人类历史文明的密切关联;第二,大多只是从经济、社会结构角度理解现代信息技术,而忽视了信息技术本身的影响力;第三,只是揭示了目前信息技术“已经影响”现代文明的事实,而没能对“如何影响”现代文明作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在这些划分中,媒介的作用力并没有得到全面认知。他们意识到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但又从媒介与人类文明这个议题的边缘划过,再一次走回了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路径。

同样专注于历史视角的媒介环境学派似乎在这方面作出了更多努力。首先,他们把研究对象明确为媒介技术本身;其次,他们广泛研究了原始社会至今人类历史长河中媒介的诸种形态;最后,他们创立了一个媒介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传播媒介的变化如何促进文化里根本的、大规模的或生态的变化”^{[9]32}。有的学者重点考察一种媒介,一个历史时期,例如爱森斯坦主要研究印刷媒介在16世纪到19世纪期间产生的社会影响。而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贯通了整个原始社会至今的人类历史长河。他们主要根据4个重要的传播时代来构想历史进程,形成了一个划分历史进程的独特方式: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术时代、电子时代^{[9]32}。在每个历史阶段,他们针对特定的媒介都发出了相似的提问。身处媒介环境里的人是如何思考和构想他们周围的现实?身处媒介环境里的人维持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新媒介的产生又是如何对上述两个问题产生改变?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过程中,为我们复原出一个个生动活泼、跃然纸上的历史生活图景。但是,环境学派的薄弱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根源于英尼斯曾经引以为傲的“模式识别”^①方法。“模式识别”方法主要靠学者的观察得来,缺乏细密的逻辑推演,另外其提出的概念大多是或明或暗的比喻,没有科学的定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理论的解说力和说服力。换言之,虽然环境学派论述了媒介对文明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4个历史分期,但仍然没能提供一个合乎哲学逻辑的解答。

信息方式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立场,揭示了媒介自身潜藏的哲学逻辑,这无疑有助于弥补媒介环境学派逻辑推演上的不足。通过对信息方式理论的探索,尤其对电子信息方式的深度考察,波斯特反观到早期媒介具有的不同哲学逻辑。就此,他相应地对媒介的历史形态进行了特定的划分:“每个时代所采用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着意义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意义的手段和关系。信息方式的诸阶段可以试做如下标示: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换。若说第1阶段的特点是符号的互应(symbolic correspondences),而第2阶段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igns),那么第3阶段的特点则是信息的模拟(informational simulations)。”^{[9]13}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交换起先以口头媒介的形式进行,这种符号交换方式由于总是以面对面的交流为前提,因而交流双方需同时在场,从而使每一次的言说都能得到及时的回馈,这就是符号之间的“互应”。印刷术的发明给人们带来了书写媒介,书写媒介使符号交换的双方分离开来,读者“在场”,作者却被隐退到文本之后,文本成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中介,它“再现”了作者的思想与读者进行“交谈”。到了电子媒介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过数字化的电子信号传达,此时,信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一种“实在”的存在,而是对信息的“模拟”。然而,在信息方式的理论框架中,媒介诸历史形态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它们不仅仅是媒介的诸历史形态,更表征着人类文明的诸历史阶段。如前述,媒介背后的哲学逻辑表明,媒介能凭借语言学意义上的结构性权力,建构着主体、世界乃至人类文明。在媒介发展的每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媒介的不同历史形态进一步构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正如波斯特所言:“我所谓的信息方式也同样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9]13}在面对面的口头媒介时期,自我(the self)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建和再生产为一种关系自我,这种被熟知的自我常常与早期的部落社会相关。在印刷的书写媒介时期,自我被稳定性和线性排列的书写文字隔离开来,被构建成一个行动者,一个具有固定身份的自信的且表达也合乎逻辑的主体,资本主义文明在这群理性、自律的自我中诞生。在电子

①英尼斯早在《传播的偏向》中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倾向提出批判,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解释模式和趋势,以便能够预测未来,而不是靠精细计算为政府和工商业提供短期的预测,从而提出了宏观层次的“模式识别”方法。

媒介时期,自我被完全退隐到电子讯号之后,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一个后现代社会正在产生。如此,媒介的诸历史形态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诸历史阶段,凭借着媒介的历史建构意义,在信息方式理论中紧密联系起来。身处批判学派团队中的波斯特无意间实现了批判学派

哲学视域和环境学派历史视角的糅合,真正合乎逻辑地划分了媒介影响下人类文明的不同历史进程,弥补了同时期社会发展理论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缺陷。在信息方式理论中,一部“信息方式”的变迁史,即成为了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参考文献:

- [1] POSTER M.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M]. New York: Polity Press, 1984.
- [2] POSTER M.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structuralism[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 马克·波斯特. 信息方式: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 范静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4] 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范静哗,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5] 张金鹏. 信息方式: 概念内涵与历史形态[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8): 15-20
- [6]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Philosophical Logics and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Media Technology

—Analysis on Poster's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JIANG Yan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n-depth reflection on previous theories, Mark Poster put forward a new method to analyze the media, which is called "mode of information". As "mode of information", media includes two factors, philosoph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ost structuralism point of view, "mode of information" illustrates the philosophical logic of media at the back: media is a kind of language in substance,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which promotes the media to build the subject, the world, and even the whole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With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logic, media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historical forms.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means diverse historical forms of media can logically build the diverse historical periods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which can compensate for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edia ecology at the same period. This theory accidentally combines the philosophical view of media critics and the historical view of media ecology together. It opens up a new dimension of contemporary media study, which is worth of academia learning and borrowing.

Key words: media; mode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ical logics; historical form;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箫姚]

(上接第 148 页)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Videotaping of Interro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ianbin's Judgment

XIE Dengke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rule of videotaping of interrogation will help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s of interrogation an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uspects in criminal procedure. However, it has drawbacks including the vague of category, the deficiency of judicial review, the lack of procedural sanction etc. The videotape of interrogation belongs to audio-visual material on proof of procedural matters, while it's confession on proof of substance matters. 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procedural sanction for serious violations of the rule by depriving its evidence capability. In the case of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rogation record and videotape, the latter has stronger probative value. Based on videotape of interrogation to establish facts, it still should follow the corroboration rule.

Key words: videotaping of interrogation; category of evidence; evidence capability; weight of evidence; procedural proof

[责任编辑: 箫姚]